

南綠北藍： 國史上孔雀種屬與地理分布的跨學科研究*

鄭 豪

[提 要] 漢文文獻所載孔雀的地理分布範圍包括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滇西南和西北塔里木盆地。這些文獻所記載的孔雀一般是綠孔雀。當一些文獻特稱西域、中亞出產的孔雀時，即指源自印度的藍孔雀。兩種孔雀在地理分布上呈現出“南綠北藍、間有交叉”的特點。維吾爾語 Kum-tuche 一詞與孔雀、鸚鵡皆無關聯，它指的是新疆特有的鳥類——白尾地鴉。歷史時期孔雀的分布範圍迅速縮小，不僅有人為捕殺、棲息地減少的原因，還有本身習性與環境適應能力的因素。孔雀在歐亞大陸生存與傳播的歷史，折射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精神關懷。

[關鍵詞] 孔雀種屬 西域 白尾地鴉 動物史 物種交換與傳播

[中圖分類號] K903; K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3 - 0169 - 12

一、問題的提出

近三十年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動物史 (Animal History) 研究逐漸興起，史學研究出現了全球史視野下的動物轉向 (the animal turn)。歐美的新動物史研究致力於發掘動物的歷史主體性，關注動物在歷史長河中的角色與地位。^①而中國國內，歷史動物地理的研究作為歷史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也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中外學界有關中國歷史時期孔雀種屬與地理分布變化的研究，就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例子。

薛愛華 (Edward Hetzel Schafer) 較早對中國歷史時期孔雀的種屬進行過分析。他認為中國南方的孔雀為“印度支那的綠孔雀”，而“漢代之前，中國人所知道的孔雀只有印度孔雀”。^②薛氏作為學識淵博的漢學家，兼具人類學的眼光與歷史語言學的知識儲備。^③他敏銳地注意到應當區分漢文史籍中記載的孔雀種屬，惜此一觀點並未引起學者的充分重視。1971~1973 年發掘的河南淅川縣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唐間絲綢之路歷史書寫和文學書寫文獻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目號：19ZDA261) 的階段性成果。承蒙陳懷宇、蔣愛花、石雲濤、黃義軍諸教授對本文寫作提供幫助，特致謝忱。

下王崗遺址發現了孔雀骨骼,但當時只對發現的部分哺乳動物骨骼進行了鑒定和描述,對孔雀骨骼僅作出了屬於孔雀屬(*Pavo sp.*)的判斷。^④奈爾(P. Thankappan Nair)的長文《亞洲的孔雀崇拜》從11個方面詳細討論了孔雀崇拜的歷史,其中提到印度藍孔雀雖非中國本土所產,但它們亮麗的尾羽成了明清兩代官階的象徵。此外他還討論了唐高祖李淵“雀屏中選”的故事。^⑤此後在歷史動物地理方面作出開創性貢獻的文煥然、何業恒兩位先生,詳細梳理古籍中關於孔雀的記載,並對歷史時期孔雀的地理分布範圍進行討論,卻並未直接回應種屬這一議題。特別是他們徑直將下王崗遺址的孔雀認定為“野生孔雀”(綠孔雀),又說“目前綠孔雀已列為我國的保護鳥之一,為了防止它的迅速減少,應嚴禁任意捕殺”,似乎“不證自明”地提出了古籍中的孔雀都是綠孔雀的觀點。^⑥王子今在文、何研究的基礎上,肯定西域龜茲應有孔雀分布的觀點,並指出龜茲孔雀應是西域本土孔雀。^⑦同樣遺憾的是,他也未對西域孔雀種屬作出分析。王守春則對王子今的觀點提出異議。他認為龜茲孔雀並非真正的孔雀,而是塔里木盆地一種名叫“Kum-tuche”的鳥。他還從羽毛顏色的角度初步分析了古籍中的孔雀應為綠孔雀。^⑧

由此看來,歷史時期孔雀的種屬問題貌似微不足道,但研究者要麼對此略而不談,未給出確切依據,要麼相關論證還有進一步補充和完善的必要。此一問題不僅是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物種認定問題,更關係到絲綢之路上外來物種的傳播與流布。考察和辨析孔雀的生存史和馴養史,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孔雀的地理分布與變遷情況,更能深化對環境史、中西交通史的認識,思考“物”在歐亞大陸上遷移與擴散的過程。故筆者不憚淺陋,結合歷史學、動物學、生態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的方法,以漢文文獻中孔雀種屬這一問題為核心予以探討分析。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二、漢文文獻孔雀種屬的判定

文煥然、何業恒曾對漢文文獻有關孔雀的記載進行較為系統全面的梳理。有關孔雀的記載雖然數量不少,時間跨度也較長,但關於孔雀外貌特徵的描述卻不多。漢文文獻所記載的孔雀,往往以籠統的“孔雀”一名言之,並不像現代科學著作那樣採用“雙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來命名。現代生物學所用的“學名”,以林奈(Carl von Linné)發明的“雙名法”為基準,即生物分類學的基本單位——種的學名形式。每個物種的學名由屬名和種加詞兩部分構成。現代生物學把孔雀分為二屬三種。二屬指孔雀屬、剛果孔雀屬,三種則包括綠孔雀(*Pavo muticus*)、藍孔雀(*Pavo cristatus*)、剛果孔雀(*Afropavo congensis*)。^⑨由於文獻記載的孔雀名稱不具備現代生物學的意義,因此判斷它們的種屬只能從其他角度進行探索。儘管古人和今人對物種界定的認識標準並不一致,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在記錄某個物種時,最直接也最容易依據外貌形態來進行描述,故而可以依據文獻記載的外貌特徵來推斷它的種屬。

在此有必要先明確生物學意義上綠孔雀與藍孔雀的差別。根據現代生物學的研究,可將二者差別列為表1。依據二者特徵的差異,又可以細分為外形與叫聲兩類。較為幸運的是,儘管文獻對孔雀外貌特徵的記載較為稀少且不完備,但還是保留了一些描述,吉光片羽,彌足珍貴。

先看漢魏時期的資料。東漢楊孚《異物志》:“孔雀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班文采。”“又曰:孔雀形體。既大,細頸,隆背似鳳凰。自背及尾皆作珠文,五采光耀,長短相次。羽毛末皆作員文,五色相繞,如帶千錢。文長二三尺,頭戴三毛長寸,以為冠。足有距。”^⑩這揭示了三個重要特徵:“自背及尾皆作珠文”,與綠孔雀頸羽為鱗狀的外形一致;“頭戴三毛長寸,以為冠”,表明孔雀頭上的羽冠呈簇形;“足有距”,這是雄孔雀的典型特徵。因此可以判斷應為雄性綠孔雀。

鍾會《孔雀賦》也說：“稟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旄以表弁，垂綠蕤之森纒。戴修尾之翹翹，若順風而揚塵。”^⑩“翠”與“綠”都點明羽毛呈現青綠色，這與綠孔雀顏色一致。同時期的楊修也撰有《孔雀賦》，他對孔雀外貌的描寫是：“首戴冠以飾貌，爰龜背而鸞頸。”^⑪“龜背而鸞頸”的描述，與楊孚“細頸、隆背”的說法基本一致。他們所見的孔雀應當屬於同一種。稍後，東晉劉欣期《交州記》記載：“孔雀色青，尾長六七尺。”^⑫同樣指出孔雀的羽毛為青色。

表 1 綠孔雀和藍孔雀的差異

比較項	綠孔雀	藍孔雀
羽冠	簇形	扇形
臉頰	黃色	白色
胸頸部羽毛	翠金屬綠色，鱗狀	金屬藍色，絲狀
體型大小	最大的雉科動物	體型相對較小
叫聲	聲高而洪亮，似“ga- wo, ga- wok”	聲腔拖長，似“wa- wa”

資料來源：綜合 Sàlim Ali, S. Dillon Ripley,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India and Pakistan*, Vol. 2: *Megapodes to Crab Plover*,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23- 128; Christine E. Jackson, *Peacock*,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6, pp. 15- 34 的分析製成。

唐宋時期文獻也有對孔雀羽毛顏色的描述。劉恂《嶺表錄異》記載“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時人捕殺孔雀，“採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為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耳”。^⑬生取鳥羽的方法類似於“點翠”，雖然血腥殘忍，但卻透露出孔雀尾呈“金翠之色”。這正符合綠孔雀的形態特徵。綠孔雀的羽毛在光線照耀之下顯現出流光溢彩的變化，故而今天的雲南人又將其稱為“金孔雀”。宋代陸佃《埤雅》引張華《博物志》佚文：“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喻如雲霞，其色無定。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⑭這裡所說的“變色”，正反映出綠孔雀羽毛在光線照耀下的變化，“舞尾有金翠”更進一步說明了它所有具有的外貌特徵。

除了記錄孔雀的外貌，文獻還對孔雀的叫聲予以著錄。《本草綱目》引唐人房千里《南方異物志》：“細頸，隆背，頭裁三毛，長寸許。……晨則鳴聲相和，其聲曰‘都護’”；“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三年尾尚小，五年乃長二三尺，自背至尾有圓文，五色金翠，相繞如錢”。^⑮這段記載模擬孔雀鳴叫聲，記為“都護”。《太平廣記》引唐人牛肅《紀聞》也說“其鳴若曰都護”。^⑯都，《廣韻》屬端母模部字，擬音 tu(上古音端母魚部，擬音 ta)；護，《廣韻》屬匣母暮部字，擬音為 yu(上古音匣母鐸部，擬音 yāk)。^⑰綠孔雀叫聲多為 ga- wo, ga- wok，帶有顫音，高且洪亮，且在清晨或傍晚發出 ha- o- ha 的長鳴聲。^⑱由此看來，文獻所記叫聲更接近於綠孔雀。

以上文獻所記的孔雀，大多來自南方。孔雀又被稱作“都護”、“越鳥”、“南客”，表明它與南方存在着密切的關聯，亦折射出中原政權勢力向南方地區的拓展。《華陽國志》記載永昌郡出產孔雀，又說雲南郡：“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⑲永昌郡在蜀漢時期治不韋(今雲南保山市東北)，雲南郡治楛棟(今雲南姚安縣北)，^⑳西晉時期治所西遷至雲南(今雲南祥雲縣東南)，^㉑大體位於滇中偏西北一帶。宋代羅願《爾雅翼》稱“孔雀，生南海”，其尾“展開如車輪，金翠煜然”。^㉒《本草綱目》引陶弘景之言稱孔雀“出廣益諸州”，又引蘇恭之言說“交廣多有，劍南元無”，^㉓表明中古文獻所記孔雀，大多來自南方，具體而言即今嶺南、雲南、中南半島一帶，這些地區恰是綠孔雀的天然居住地，與藍孔雀的天然居住地南亞並不重合。

綠孔雀的分布範圍逐步由北向南退卻，文煥然等認為主要是人為捕殺導致的。具體原因又包括食用、裝飾用和藥用三個方面。^②筆者基本認同這一觀點，但除外在干擾因素，其他內在因素的影響也不可忽視。誠然，人為捕殺是導致綠孔雀分布範圍逐步縮小的原因之一，但綠孔雀自身的原因同樣值得重視。原產於印度和斯里蘭卡的藍孔雀，它們的天然棲息地也遭到了人類的大量破壞。但藍孔雀在今日的分布範圍遠遠大於綠孔雀。它們不僅生活在原生地，還廣泛分布在安達曼群島、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本土和夏威夷的一些島嶼，儘管數量不多，卻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種群數量。^③無論綠孔雀還是藍孔雀，它們都是一種在自然環境中不會遷徙的鳥，缺乏長距離飛行的能力。孔雀的長途遷徙與繁衍生息，完全是人類干預的結果，也反映出人與自然之間的共生與互動。除了人為的捕殺與棲息地減少外，兩種孔雀不同的生存習性也決定了它們的適應能力。綠孔雀生性機警，膽小怕人，一般成對或 1 只雄鳥伴隨 3~5 只雌鳥和亞成體一起出現，主要活動在河谷地帶的常綠闊葉林及落葉闊葉林、針闊混交林和稀疏草地中，生存環境較為隱蔽。^④這與藍孔雀的生活習性大不相同。早在公元前 2 世紀，羅馬人就已懂得如何喂養藍孔雀。^⑤這說明藍孔雀人工馴養的歷史要遠遠超過綠孔雀。它們更適宜與人相處的環境，其種群數量常常有 14~15 只乃至更多。基於線粒體基因對二者遺傳差異的分析，也證實了它們的 COI 基因在各項指標方面均具有明顯差異。^⑥這些都意味着在天然棲息地減少的情況下，藍孔雀比綠孔雀更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人類的捕殺固然是加劇綠孔雀分布範圍急劇縮小的重要誘因，但其自身習性與環境適應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的命運。^⑦內外兩重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終導致綠孔雀的分布範圍逐漸縮小，如今在中國境內只能蜷縮於雲南一角。

以上輯錄漢魏至唐宋時期的文獻記載，結合綠孔雀天然棲息地的分布範圍，證實其所記的“孔雀”，一般而言都是指綠孔雀。歷史時期綠孔雀地理分布範圍的變化，不僅與人為捕殺、棲息地減少有關，更與它本身的習性與環境適應能力息息相關。

三、西域孔雀存在的可能性與種屬分析

文煥然、何業恒曾指出：“西北塔里木盆地也有孔雀的記載，但還待驗證。”^⑧王子今則從文獻的角度，指出西域歷史上可能存在原生孔雀，但亦未排除西域孔雀可能來自天竺等地的可能。《北史》、《魏書》有關西域孔雀的記載確實難以否定。然並不意味着西域孔雀就是當地的原生物種。以下筆者從西域孔雀的種屬這一角度切入，試圖解答此問題。

歷史上的中西交通，主要發生在西域和南海。憑借中西交通而展開的物種交流，亦由此分為兩條線路：北路為西域，南路為南海。異域孔雀由域外傳入中國的路徑，也不出這兩條之外。

首先看南路。這一路由中南半島傳入兩廣雲南，再進入中原。《漢書》記載南越王尉陀曾向漢文帝獻“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⑨《後漢書》也記載滇地“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⑩孫吳曾“使察戰到交趾調孔爵、大豬”。^⑪綠孔雀曾廣泛分布在嶺南、滇西南和中南半島，^⑫因此上述文獻所記，一般而言都指綠孔雀。但要注意文獻還記載南方有白孔雀進貢。梁任昉《述異記》記載宋武帝大明五年（461），“廣郡獻白孔雀，以為中瑞”。^⑬白孔雀是藍孔雀的一個變種，並不屬於綠孔雀。^⑭這意味着由南路傳入中國的孔雀，不僅有綠孔雀，也有來自更遙遠的印度半島的藍孔雀變種夾雜其間。

再看北路。這一路由印度半島及斯里蘭卡經絲綢之路傳入西域，再進入中原。儘管古羅馬克勞迪烏斯（Claudius）皇帝統治時期，僧伽羅王國（今斯里蘭卡）使者前往羅馬，聲稱他們的祖先曾經印度和喜馬拉雅山脈到達中國，^⑮但西域諸國進貢孔雀較為確鑿的記載卻是到了 3 世紀以後。《晉

書》記載“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犂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³⁹《北史》、《魏書》也記載龜茲“土多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孳乳如雞鶩，其王家恒有千餘只”。⁴⁰王子今認為這裡的孔雀應是西域本土的孔雀，王守春則認為它們是塔里木盆地的 Kum-tuche 鳥。⁴¹

王子今敏銳地注意到西域孔雀的記載，確為卓識。遺憾的是他未注意到這一時期的氣候環境變化。東漢後期以後，西域地區氣候趨冷，南北朝時期普遍較為寒冷，局部地區氣候變化可能更明顯。相較於接近天山、靠近博斯騰湖的焉耆（今新疆焉耆），龜茲（今新疆庫車）“唯氣候少溫為異”，⁴²即在不甚溫暖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龜茲的氣候較周邊地區還要更為寒冷。龜茲本土若出產孔雀，那麼寒冷的氣候條件顯然不太適宜綠孔雀生存。從史源學角度來看，《北史·西域傳》與《魏書·西域傳》的記載雖相同，但後者早已散佚，今本《魏書·西域傳》乃是後人自《北史·西域傳》抄錄而來，二者實同出一源。後世文獻有關龜茲“孔雀”的歷史記憶，也基本承襲兩書的說法，在史源學上隸屬同一系統。

《漢書》和《後漢書》都記載罽賓、條支出產“孔爵（雀）”。⁴³漢代的罽賓以犍陀羅、呾叉始羅為中心，強盛時期曾囊括了喀布爾河上遊和斯瓦特河流域。⁴⁴條支，有人認為是兩河流域的安條克，有人認為是以敘利亞為中心的塞琉西王國。⁴⁵不論如何，條支應為西亞古國。雖然史籍記載這些地區出產孔雀，但實際上中亞和西亞的孔雀並非本土原產，而是從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傳入。《聖經》已有孔雀被帶往今敘利亞一帶的記載。⁴⁶前 8 世紀晚期，藍孔雀進入美索不達米亞。隨着波斯帝國的建立與大流士一世（Darius I）的擴張，藍孔雀開始大量進入小亞細亞、希臘和羅馬。⁴⁷藍孔雀在中東地區廣為人知，且它們較為適應人工飼養和繁殖，對氣候的適應能力也較強。5~6 世紀，薩克遜人征服不列顛的大部分地區。這一時期的文化遺址中，曾發現孔雀的一根骨骼。⁴⁸雖然無法據此確定當時的不列顛是否有孔雀存活，但 20 世紀末的鳥類學家發現，在不太寒冷的英國南部地區，養在柵子裡的藍孔雀能夠在半人工喂養的狀態下安然度過冬季。不列顛地區大致位於北緯 50°~54°，龜茲的地理位置稍微偏南，大致在北緯 40°~42°。孔雀“群飛山谷間”的記載，表明當地複雜多變的山谷地形為它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較為溫和的局部氣候環境，故而能夠形成一定的種群數量，經年累月之後便成為當地的物產之一。⁴⁹歷代史書《西域傳》的記載，基本來自中原使臣的報告，在著述體例上多以人為本，主要記載中國與四夷的政治關係。⁵⁰中原使臣不瞭解藍孔雀的傳播繁衍過程，誤以為它們是當地原生物種，留下了龜茲“土多孔雀”的記載。即使龜茲等地確實出產孔雀，也應是由中亞、西亞等國輾轉引進而來的藍孔雀，只不過在當地經由人工培育形成了一定的種群數量。歷史上的西域不僅是華戎交匯、多文明匯集之地，也是歐亞大陸物種交換與傳播的重要場所。

西域所產孔雀應為藍孔雀，亦可從後世材料得到印證。乾隆二十三年（1758）六月，哈密進貢孔雀，乾隆帝為此在頤和園賦詩《孔雀開屏》，收入《御製詩二集》，同時還題寫在了北京故宮藏《清人畫弘曆閱孔雀開屏圖》以及台北故宮藏《孔雀開屏圖》兩幅畫上。前一幅圖為郎世寧、金廷標二人合筆的作品，後一幅圖為郎世寧作品。二者均畫於乾隆二十三年，且具有高度的寫實性。⁵¹從兩幅畫中所繪的孔雀形象來看，頭上的羽冠呈扇形，頸羽為金屬藍色，臉頰為白色。這都與藍孔雀的外貌特徵若合符契。乾隆帝詩作說“三年小尾五年大，花下開屏金翠簾。綵羽映日燦輝輝，圓眼凌風張個個。低飛嫩篠高屋簷，繡翼雙窺玳瑁簾。招之即來拍之舞，那慮翻翻蔥嶺尖”，⁵²則是擬古之詞，幾乎沿用了文獻中對綠孔雀的記載化用為詩。風雅好古的乾隆帝完全沒有意識到他所看到的藍孔雀與綠孔雀並非同一物種，徑自把對綠孔雀的描繪之詞移用到了藍孔雀身上。同一時期余省、張為邦摹蔣廷錫《鳥譜》中的《孔雀》與《開屏孔雀》兩幅圖，頸羽均為翠金屬綠色，臉頰為黃色，羽

冠呈簇形，頸羽為鱗狀。它們與宋代崔白《枇杷孔雀圖》、《宋人十八學士圖》、元朝邊魯《孔雀芙蓉圖》、明朝呂紀《杏花孔雀圖》所繪的形象別無二致，可知他們所繪均為綠孔雀。《宣和畫譜》記載唐德宗時新羅進貢孔雀，皇帝召令畫家邊鸞描繪。儘管畫作沒有流傳下來，但據《畫譜》記載，他所描繪的孔雀形象，乃是“於賁飾彩翠之外，得婆娑之態度”。⁵³“彩翠”即是鮮豔翠綠之色，可見他所見的孔雀也應是綠孔雀。新羅的綠孔雀來源雖然不明，但顯然也是從嶺南及中南半島一帶引入的。由此可以推定，如果不是專門記錄和描繪經由西域進貢的孔雀，那麼文獻、古畫所記載描繪的孔雀，應該都是綠孔雀。由於綠孔雀的形象深入人心，故在描繪西域進貢的藍孔雀時，無論身為皇帝的乾隆帝還是撰述的史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原本屬於綠孔雀形象的描述移用到了藍孔雀身上⁵⁴。若不是畫家以寫實的手法予以描繪，幾乎無法辨認西域孔雀與其他記載中孔雀的差異。在近代以前，藍孔雀尚未大規模在中國境內繁衍生息，只是作為異域奇珍進獻給宮廷。無論宮廷還是民間，一般所能見到的孔雀還是綠孔雀。

四、Kum- tuche 的語言分析與種屬判定

王守春認為 Kum- tuche 鳥“可能就是《魏書·西域傳》記載的龜茲國的‘孔雀’”，筆者認為這一說法不能成立。⁵⁵Kum- tuche 鳥源自英國人亨利·蘭斯代爾(D. Henry Lansdell)於19世紀末在塔里木盆地西部的考察記錄。據蘭氏的記述，此鳥的名字為 *Podoces*，突厥語(即維吾爾語)稱為 Kum- tuche。王氏將 *Podoces* 認定為“白尾地鴉”、“黑尾地鴉”、“褐背地鴉”一類的鳥。這一認定方向雖然正確(*Podoces* 即“地鴉”之意)，但他將原文的“鴉”誤作“鴨”，致使在物種的判定上出現了嚴重的偏差與混亂，繼而造成了對突厥語 Kum- tuche 一詞含義的誤解。

《新疆南部的鳥獸》一書將黑尾地鴉(*Podoces hendersoni*)、白尾地鴉(*Podoces biddulphi*)、褐背地鴉(*Podoces or Pseudopodoces humilis*)歸入雀形目(Passeriformes)椋鳥科(Sturnidae)，⁵⁶《中國動物志》則將它們歸入雀形目鴉科(Corvidae)地鴉屬(*Podoces* Fischer)。⁵⁷雖然二書對具體的科屬存在差別，但上述幾種地鴉均屬於雀形目，應無疑義。⁵⁸而“鴨”屬於雁形目(Anseriformes)，在鳥類生態類群中屬於游禽，與生活在沙地環境中的地鴉屬(鳴禽地棲)並不相類，不可混為一談。此為其一。王氏認為在19世紀後半葉，“科學界還沒有對其進行科學分類”，這種說法也不準確。蘭氏在文中說明，當時已知的地鴉包括了里海/土庫曼地鴉、黑尾地鴉、褐背地鴉和白尾地鴉4個變種，只是未確定它們在分類學上的位置。⁵⁹此為其二。其三，蘭氏捕捉和運送到英國的都是白尾地鴉。蘭氏引述德萊塞(Dresser)之言，認為這類鳥是這一地區特有物種，“僅限於草原地區”，在歐洲非常少見。他又引述艾倫·休姆(Allan Hume)的話，指出黑尾地鴉“在外表形態上最接近於紅嘴山鴉”。最後還說：“在我收集的運到英國的一種 *Podoces* 鳥，是被比杜爾夫(Biddulph)確定的那種鳥(*P. biddulphi*)。”⁶⁰黑尾地鴉和白尾地鴉在形態上的區別僅在於前者頰部不呈黑色，且尾羽全黑。筆者將蘭氏對地鴉的描述以及《中國動物志》對白尾地鴉的記載進行了對比(見表2)。綜合蘭氏的觀察記述以及最終的物種鑒定結果來看，他捕捉到的地鴉應是白尾地鴉。但不知何故，王氏認為蘭氏觀察到的是黑尾地鴉，運到英國的才是白尾地鴉。

綜合上文討論可知，雀形目的地鴉與雞形目的孔雀不僅在外形上(大小、顏色)差別很大，而且從生活習性與生存環境來看，龜茲孔雀“群飛山谷間”，主要生活在林間草地或稀疏草原，地鴉則生活在植被稀疏的多沙荒漠。二者的外形和生存環境大相逕庭，當地民眾不至於將它們混為一談。

王守春認為，“從讀音上，‘Kum- tuche’急讀，類似漢語‘孔雀’的讀音”。⁶¹19世紀“孔雀”二字

的漢語發音與今日相差無幾,比較接近突厥語 Kum- tuche。但《北史》、《魏書》成書的中古時代,“孔雀”二字的讀音無法與 Kum- tuche 勘同。孔,《廣韻》記為康董切,溪母董部字,擬音為 k' uŋ; 雀,《廣韻》記為即略切,精母藥部字,擬音為 tsiak。^⑤在中古音中,“雀”字是一個收聲為 k 的入聲字。唐代常用收聲為 k 的“屋”、“沃”、“藥”、“鐸”等十二韻的字去譯寫外來語音節有 q、gh、k、g 收聲的字。^⑥Kum- tuche 不屬於音節有 q、gh、k、g 收聲的字,成書於唐代的《北史》以及同一史源的《魏書·西域傳》,不大可能用“雀”字去對譯外來語 tuche。實際上,“孔雀”這一名字並非外來語的音譯。“孔雀”的“孔”,原意為“大”。《本草綱目》:“孔,大也。”^⑦《道德經》:“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德”即大德。在上古音中,“雀”與“爵”同屬精母藥部字,讀音相近,二者可以相通。《孟子·離婁上》:“為叢驅爵者,鷓也。”《集注》:“爵,與雀同。”^⑧在漢代,雀、爵又常常互用。《漢書·西域傳》把“孔雀”寫作“孔爵”。《本草綱目》又說:“梵書謂之摩由邏。”^⑨摩,《廣韻》屬明母戈部字,擬音為 muɑ; 由,《廣韻》屬余母尤部字,擬音為 jɪu; 邏,《廣韻》屬來母歌部字,擬音為 la。^⑩這一擬構的中古讀音與梵文對孔雀的稱呼“mayura”非常契合。^⑪故而梵文“摩由邏”(mayura)應是孔雀外來語名字的音譯。漢字的“孔雀”,意為大鳥,與外來語毫無瓜葛。

表 2 蘭斯代爾與《中國動物志》所記白尾地鴉比較

比較項	蘭斯代爾的描述	《中國動物志》所載白尾地鴉
長度	11.5(292.1)	267~312
嘴	黑色	黑色
腿	黑色	黑色
足	黑色	黑色
上身	未描述	沙褐色
下體	未描述	乳黃色
尾巴覆羽	黑色,很長	大覆羽呈發紫色光輝的黑色
頭部	黑色,略帶有紫蘭色的金屬般的光澤	呈發金屬藍輝的黑色
頭背頂部	黑色,略帶有紫蘭色的金屬般的光澤	呈發金屬藍輝的黑色
尾巴	一白色的帶	尾白
習性	習慣在沙地中沐浴,像是某些 Babblers (按:即斑鶉),善於奔跑	常在荒漠間奔跑,很少飛行
分布地	從阿克蘇到瑪拉爾巴什(今巴楚)	南疆地區、塔里木盆地、拜城、阿克蘇、巴楚、和田等地

注釋:表中比較項,均以雄鳥為依據。蘭斯代爾所用長度單位為英寸,《中國動物志》所用長度單位為毫米。1英寸=25.4毫米,表中括號內為折算後的公制長度。《中國動物志》對嘴、腿、足的顏色未加描述,此處依據附圖以及 Ming Ma, Status of the Xinjiang Ground Jay: population, breeding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Chinese Birds* 2011, 2(1), pp. 59- 62 所附照片補充。

蘭斯代爾早已指出,Kum- tuche“據說是‘沙鳥’之意”。Kum 意為沙,tu che 意為鳥或雀,Kum- tu che 即是“沙鳥(雀)”。可見蘭氏非常清楚突厥語 Kum- tu che 就是拉丁語 *Podoces*,並未將它與孔

雀聯繫起來。但王氏視語言本身的含義於不顧，徑自將 Kum- tuche 理解為孔雀，並將《西域圖志》記載的“沙圖提”解釋為 Kum- tuche 意譯和音譯的混合譯名。《西域圖志》：“孔雀，名託古斯。”^①又說：“鸚鵡，曰沙圖提。”^②維吾爾語把孔雀稱作 toz，把鸚鵡稱作 jatuti。^③顯然漢語的“託古斯”、“沙圖提”即維吾爾語 toz 和 jatuti 的音譯，“沙圖提”並非 Kum- tuche 意譯和音譯的結合。toz、jatuti、Kum- tuche 三個詞均有所指，分別意為孔雀、鸚鵡、白尾地鴉（沙鳥），三者含義清晰，定名準確，並不相類。^④上文所引乾隆二十三年哈密進貢孔雀以及郎世寧等人圖繪孔雀的記錄，以及《西域圖志》有關維吾爾語孔雀專名的記載，不僅清楚地表明西域出產孔雀的事實，而且時人（不論漢人、維吾爾人還是外國人）非常清楚孔雀的形象與特徵（儘管在吟詠作詩時常用形容綠孔雀的詞匯去描繪藍孔雀），但不會把它與 Kum- tuche 混為一談。由此可以判定，將龜茲孔雀視作 Kum- tuche 鳥的觀點根本無法成立。維吾爾語 Kum- tuche 一詞，指的是新疆特有的鳥類——白尾地鴉。^⑤

五、結論：重新認識孔雀生存和傳播的歷史

本文從漢文傳世文獻有關孔雀種屬的問題切入，重新分析和討論了歷史時期孔雀的種屬及其地理分布變化。歷代漢文文獻所記載的孔雀，一般都指綠孔雀。當特稱西域、中亞出產的孔雀時，它所指的才是源自印度的藍孔雀。因此可將有確切文獻記載的藍孔雀傳入中國的時間追溯至西漢。依據物種傳播的路徑、有關西域孔雀的文字、繪畫、語言材料，可知歷史時期孔雀的分布範圍包括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滇西南和西北塔里木盆地。前三者主要為綠孔雀（間有藍孔雀變種），西北則為來自印度半島的藍孔雀。兩種孔雀在地理分布範圍上呈現出“南綠北藍、間有交叉”的特點。維吾爾語 Kum- tuche 與孔雀、鸚鵡皆無關聯，它指的是新疆特有的鳥類——白尾地鴉。歷史時期孔雀的分布範圍迅速縮小，不僅有人為捕殺、棲息地減少的原因，還有綠孔雀本身習性與環境適應能力的因素。

重新對漢文文獻中孔雀的種屬進行分析與認定，不僅可以窺探歷史時期生態環境的變化，也為我們在全球史的視野中考察人與自然的關係提供了新的範例。以絲綢之路作為紐帶，孔雀在歐亞大陸上不斷被傳播、擴散。人們把孔雀帶往世界各地，而孔雀也在擴散過程中重塑了當地的社會與文化。在印度本土，孔雀被視作是一種神聖的動物，與神相關聯。佛教文學興起後，孔雀更與孔雀王的觀念緊密結合，成為神靈的化身。在中東和西方世界，孔雀作為羽毛貿易的供應者，進而被馴養成為餐桌上的重要食材之一。^⑥在中國，無論是綠孔雀還是藍孔雀，長期以來被視為異域文化的代表和象徵。作為一種珍禽，它代表着古人對異域文化的認知與想象，衍生出關於孔雀性行為、隨音樂起舞的種種奇聞，並發展出相關的詩歌和藝術。^⑦孔雀作為一種“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觀念中，呈現出不同的面相，表達出相互聯繫但又有所區別的文化內涵。古人對孔雀的諸多想象與描繪，反映出絲綢之路上物種交流對不同地區生存模式乃至文化藝術的深刻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其說孔雀屬於物質世界，不如說它更屬於精神世界。孔雀在歐亞大陸生存與傳播的歷史，折射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精神關懷。包括孔雀在內的動物史研究，不僅是溝通文學、史學、宗教、藝術等諸多學科的紐帶，也是審視人與自然關係的一扇窗口。

① 陳懷宇：《動物史的起源與目標》，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19年第3期。收入陳懷宇《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增訂本，第439~451頁。

- ②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96-97.
- ③ 李丹婕:《薛愛華與〈朱雀〉的寫作背景》,包偉民、劉後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2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327~340頁。
- ④ 賈蘭坡、張振標:《河南浙川縣下王崗遺址中的動物群》,北京:《文物》,1977年第6期。
- ⑤④⑦④ P. Thankappan Nair, *The Peacock Cult in Asia*, *Asian Folklore Studies* 33(2), 1974, pp. 130-131; p.93; pp. 93-170.
- ⑥⑤③③⑤ 文煥然、何業恒:《中國歷史時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變遷》,《歷史地理》創刊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2~139頁。
- ⑦ 王子今:《龜茲“孔雀”考》,天津:《南開學報》,2013年第4期。
- ⑧⑥① 王守春:《新疆孔雀名物考與孔雀河名的由來》,烏魯木齊:《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
- ⑨ 中國科學院中國動物志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動物志:鳥綱》第4卷《雞形目》,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年,第188頁;J. del Hoyo, A. Elliott, J. Sargatal eds.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 Vol. 2, New World Vultures to Guinea-fowl*, Barcelona: Lynx Editions, 1994, p. 552。關於剛果孔雀分類的爭議,參見 R. T. Kimball and others, Resolution of the phylogenetic position of the Congo peafowl, *Afropavo congensis*: a biogeographic and evolutionary enigma, *Proc. R. Soc. Lond. B* (1997) 264, pp. 1517-1523.
- ⑩ 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九二四《羽族部十一·孔雀》引東漢楊孚《異物志》,北京:中華書局縮印商務印書館影宋本,1960年,第4104頁下欄。
- ⑪⑫ 歐陽詢撰:《藝文類聚》卷九一《鳥部中·孔雀》引曹魏鍾會《孔雀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75頁;第1574頁。
- ⑬ 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九二四《羽族部十一·孔雀》引東晉劉欣期《交州記》,第4104頁下欄。
- ⑭⑰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四六一《禽鳥二·孔雀》引唐劉恂《嶺表錄異》“交趾”條,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3774頁。又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九二四《羽族部十一·孔雀》,第4104頁下欄。
- ⑮ 陸佃:《新刊埤雅》卷七《釋鳥·孔雀》,《五雅》叢書本,嘉靖新安畢氏刊本,東京:東洋文化研究所藏,葉6a。
- ⑯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九《禽四·孔雀》引《南方異物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74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98頁下欄。
- ⑰⑱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03頁、第94頁;第283頁、第46頁。
- ⑲ 中國科學院中國動物志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動物志:鳥綱》第4卷《雞形目》,第190~191頁;楊嵐等編著:《雲南鳥類志》上卷《非雀形目》,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第318頁;Christine E. Jackson, *Peacock*,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6, p. 23。
- ⑳ 常遽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卷四《南中志》,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第430、443頁。
- ㉑⑳ 胡阿祥、孔祥軍、徐成:《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三國兩晉南朝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77~478頁;第673頁。
- ㉒ 羅頌撰,石雲孫點校:《爾雅翼》卷十三《釋鳥一》,合肥:黃山書社,1991年,第136頁。
- ㉓④⑥⑥ 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九《禽四·孔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74冊,第398頁下欄。
- ㉔ Christopher Lever, *Naturalized Birds of the World*, London: Longma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1987, pp. 186-189.
- ㉕ 楊嵐等編著:《雲南鳥類志》上卷《非雀形目》,第318頁。
- ㉖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p. 96.
- ㉗ 段玉寶等:《基於線粒體基因分析藍孔雀與綠孔雀的遺傳差異》,南寧:《基因組學與應用生物學》,2020年第2期。
- ㉘ 關於歷史時期乃至地質時期眾多生物消亡原因,學界一般持有三種觀點。以猛犸象的滅絕原因假說為例,一種認為氣候的波動與自然環境的變遷導致了生物的滅絕。Y.V. Kuzmin, L.A. Orlova, Radiocarbon chronology and environment of woolly mammoth (*Mammuthus primigenius* Blum.) in northern Asia: Results and perspectives, *Earth Science Reviews*, 2004 (68), pp. 133-169; 另一種則認為人類活動對生物滅

絕存在着顯著的影響 (V. Pankovic, R. Glavatovic, N. Vunduk, et al. A “quasi-rapid” extinction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mammoths overkill, *Quantitative Biology*, 2006 (7), pp. 1-11); 第三種觀點則綜合上述二者, 認為環境變化與人類活動共同造成了物種的滅絕 (D. Pushkina, P. Raia, Human influence on distribution and extinctions of the late Pleistocene Eurasian megafaun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08, 54 (6), pp. 769-782)。筆者認為, 由於缺乏在連續的時間—空間維度上, 針對環境變化或人類活動導致物種遷移或滅絕的定量分析, 因此很難區分二者在生物滅絕中所扮演的作用及其大小。以獨立的氣候環境變化和化石動物的年代序列為參照系所得出的結論, 傾向於認為缺乏足夠的證據說明動物群的絕滅與人類活動相關, 而運用動物形態學與動物分類學方法研究古代文物中化石動物形象, 以及基於歷史文獻研究的成果, 則提示應當充分重視人類活動對動物的影響。參見侯甬堅、張潔:《人類社會需求導致動物減少和滅絕——以象為例》, 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報》, 2007年第5期; 張虎才:《我國東北地區晚更新世中晚期環境變化與猛犸象—披毛犀動物群絕滅研究綜述》, 蘭州:《地球科學進展》, 2009年第1期; 李冀、侯甬堅、李永項:《古代文物中的化石動物形象及其環境意義》, 西安:《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3年第4期。

②班固:《漢書》卷九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62年, 第3852頁。

③范曄撰, 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65年, 第2846頁。

④陳壽:《三國志》卷四八《吳書·三嗣主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59年, 第1160頁。

⑤任昉:《述異記》卷下,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 1985年, 第30頁。

⑥朱世傑等:《孔雀屬孔雀線粒體細胞色素 b 基因全序列分析及其系統進化研究》, 廣州:《中山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4年第43卷第6期; 歐陽依娜等:《利用細胞色素 b (Cyt b) 基因分析綠孔雀和藍孔雀的遺傳分化》, 昆明:《雲南農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9年第24卷第2期。藍孔雀有3個變種: 白孔雀、雜色孔雀和黑翅孔雀。綠孔雀有3個亞種:

爪哇綠孔雀 (*Pavo muticus muticus*)、印度支那綠孔雀 (*Pavo muticus imperator*) 和緬甸綠孔雀 (*Pavo muticus spicifer*)。中國境內現存的綠孔雀亞種只有1個, 即印度支那綠孔雀。

③⑧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An Egyptian Monk*, Trans and Edited,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J. W. McCrind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70; James Emerson Tennent, *Ceylon: An Account of the Island Physical, Historical, and Topographical with Notices of Its Natural History, Antiquities and Productions*, Vol. 1, London: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4, p. 542.

③⑨ 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六《張軌傳附張駿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2235頁。

④④② 李延壽:《北史》卷九七《西域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3218頁; 第3217頁。魏收撰:《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 北京:中華書局, 2017年, 第2458頁; 第2457頁。

④④ 王子今:《龜茲“孔雀”考》; 王守春:《新疆孔雀名物考與孔雀河名的由來》。

④③ 班固:《漢書》卷九六《西域傳上》, 第3885頁; 范曄撰, 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 第2918頁。

④④ 余太山:《屬賓考》, 烏魯木齊:《西域研究》, 1992年第1期。

④⑤ 余太山:《條支、黎軒、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 北京:《中國史研究》, 1985年第2期; 龔纓晏:《20世紀黎軒、條支和大秦研究述評》, 北京:《中國史研究動態》, 2002年第8期。

④⑦ Shivendra B. Kadgaonkar, *The Peacock in Ancient Indian Art and Literature*, *Bulletin of the Deccan College Research Institute* 53, 1993, pp. 101-102; Christine E. Jackson, *Peacock*, pp. 86-96.

④⑧ Christine E. Jackson, *Peacock*, p. 96.

④⑨ 關於漢代傳入中國的異域物產, 參見唐啟宇編著:《中國農史稿》, 北京:農業出版社, 1985年, 第300~304頁。

⑤⑩ 李錦繡:《〈通典·邊防典〉“吐火羅”條史料來源與〈西域圖記〉》, 烏魯木齊:《西域研究》, 2005年第4期。薛愛華早已指出:“漢朝人對於孔雀的瞭解也只

是限於傳聞，這些傳聞可能是由過往的行人帶來的。”(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p. 96) 魏晉南北朝時期關於西域物種的記載，也基本沿襲了漢朝的情形。這種認識上的“偏差”，與古代對異域物種的認識有着密切的關聯，反映出中原地區的人們對邊裔自然與社會的認識與想象。

⑤①劉輝：《清宮“孔雀開屏圖”考證》，北京：《故宮學刊》，2013年第2期，第311~322頁。

⑤②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二集》，《乾隆御製詩文全集》第2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影印清光緒刻本，第638頁上欄至下欄。

⑤③《宣和畫譜》卷十五《花鳥一·邊鸞》，台北：故宮博物院景印元大德吳氏刻本，1971年，葉3a。⑤④王守春引用祁韻士《西陲竹枝詞·孔雀》一詩：“圓眼金翎映日高，屏開璀璨翠舒毫，吉光片彩因人顯，聲價當時重異遭”，認為這裡所描寫的應是綠孔雀。顯然他沒有意識到祁韻士與乾隆帝一樣，只是襲用描繪綠孔雀的詞匯來形容藍孔雀。

⑤⑤胡文康和王炳華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西域孔雀是雉雞的准噶爾亞種，並主張孔雀河之名與孔雀有關。參見胡文康、王炳華：《羅布泊：一個正在解開的謎》，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66頁。

⑤⑥錢燕文等：《新疆南部的鳥獸》，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年，第109~110頁。

⑤⑦中國科學院中國動物志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動物志：鳥綱》第9卷《雀形目（太平鳥科—岩鷓科）》，第174~178頁。

⑤⑧全球共有4種地鴉：黑尾地鴉、白尾地鴉、黑海/土庫曼地鴉（*Podoces panderi*）、波斯地鴉（*Podoces pleskei*）。褐背地鴉的分類存在爭議，有的認為屬於地鴉屬，有的列為擬地鴉屬（*Pseudopodoces*）。參見李春秋、鄭作新：《關於擬地鴉屬確立問題的商榷》，北京：《動物分類學報》，1965年第2期，第178~182頁；中國科學院中國動物志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動物志：鳥綱》第9卷《雀形目（太平鳥科—岩鷓科）》，第178~180頁；馬鳴等：《白尾地鴉：塔克拉瑪干特有物種》，烏魯木齊：新疆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第26~29頁。

⑤⑨蘭氏的此次考察發生在1888年。普爾熱瓦爾斯基於1876~1877年第二次前往中國探險，在羅布泊發現了地鴉屬新種。當時只知道3個種，普氏將他發現的種命名為*Podoces tarimensis*（塔里木地鴉）。他在注釋中詳細描述了該鳥的特徵，並附上了照片，註明為Таримская сойка（塔里木松鴉）。結合普氏的描述以及照片來看，他發現的就是白尾地鴉。他還把這種鳥稱為 *саксаульная сойка*（撒克遜松鴉）。參見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От Кульджи за Тянь-шань и на Лоб-нор, Москва: ОГИЗ,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7, Стр. 47(插圖在第64~65頁之間); Tiziano Londei, About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Xinjiang Ground Jay (*Podoces biddulphi*), *Chinese Birds* 2013, 4(2), pp. 184 - 186.

⑥⑩比杜爾夫即在新疆收集情報的英國上校約翰·比杜爾夫(John Biddulph)。他於1874年在巴楚地區的叢林中最早採集到了白尾地鴉的標本。後來英國業餘鳥類專家、政治家艾倫·休姆(Allan Hume)將比杜爾夫採集到的標本定名為“比杜爾夫地鴉”。參見馬鳴等：《白尾地鴉：塔克拉瑪干特有物種》，第44~48頁。

⑥⑪韓儒林：《關於西北民族史中的審音與勘同》，《穹廬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8頁。

⑥⑫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81頁。邢義田注意到漢代畫像中所謂的“樹木射鳥圖”，實際上應為“射爵射侯圖”。漢代“雀”與“爵”通假極為平常，“射雀”即是“射爵”，象徵着獵取官爵。參見邢義田：《漢代畫像中的“射侯射爵圖”》，台北：《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0年第71本第1分，第1~60頁。

⑥⑬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第26頁、第35頁。梵文 mayura 意即“捕蛇鳥”。

⑥⑭ *Buddhist Art in India*, Translated from the “Handbuch” of Prof. Albert Grünwedel, by Agnes C. Gibson,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Jas. Burgess,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901, p. 70; Christine E. Jackson, *Peacock*, p. 45.

⑥⑮⑯傅恒等：《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四十三《土產·准噶爾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00冊，第816

頁上欄;第 822 頁上欄。

① 趙相如、朱志寧編著:《維吾爾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 227 頁。

② 《回疆志》卷二《衣冠》記載回人女子用孔雀翎裝飾頭部,《中國方志叢書》西部地方第 1 號影印乾隆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 68~69 頁。《新疆圖志》也記載當地纏回婦女在帽子上插孔雀毛作為裝飾,參見王樹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圖志》卷四十八《禮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 856 頁。

③ 王式的這一誤判還導致了他對孔雀河名字由來的錯誤結論。他認為孔雀河的名字同樣來自 Kumtutche。中國境內有兩條名為“孔雀河”的河流。一條發源於西藏阿里地區普蘭縣,藏語稱為“馬甲藏布”。Majja 意為孔雀,應來自梵語 mayura;Zangbo 意為江河。“馬甲藏布”為音譯,“孔雀河”為意譯,這一譯名與孔雀有關。另一條位於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庫爾勒市和尉犁縣,發源於博斯騰湖,最終注入羅布泊。維吾爾語稱為 kōntji derja。kōntji 意為製皮匠,derja 意為江河,該詞的本義為“製皮匠之河”。參見李樹輝:《新疆地名文化:語源、語義和文化特點》,新疆石河子:《石河子大學學報》,2017 年第 4 期。王守春認為“孔雀河”不應是 kōntji derja 的音譯,原因是庫爾勒以下的河段人煙稀少,沒有什麼成規模的手工業。筆者認為王氏完全誤會了維吾爾語 kōntji derja 的本義,也不瞭解孔雀河生態環境的變遷過程。清代文獻《回疆志》、《西域圖志》將孔雀河稱為開都河或海都河。陶保廉指出“回語曰共奇達里雅”,表明該河名來自維吾爾語。“共奇”是維吾爾語 kōntji 的音譯,“浣溪”、“孔雀”皆是漢譯名口耳相傳過程中的“以訛傳訛”。陶保廉著,劉滿點校:《辛卯侍行記》卷 6《吐魯番歧路(附)》,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408 頁。1896 年斯文·赫定來到孔雀河畔時,稱“河水碧綠晶瑩,異常可愛”。當時孔雀河水位很高,加之河水呈現出碧綠色,與孔雀的羽毛顏色相似,應是漢譯名“共奇”音訛為“孔雀”後為民眾所認可並流傳至今的原因。參見斯文·赫定:《生死大漠》,田杉編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41 頁。孔雀河之名還見於《新疆圖志》卷七十、

卷七十一,後者又稱為“共琦河”。參見王樹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圖志》卷七十《水道四》“塔里木河”條、卷七十一《水道五》“開都河”條,第 1280~1281 頁、第 1297~1298 頁。清朝時孔雀河下遊的羅布泊地區雖人跡罕至,但絕非荒無人煙。乾隆二十三年(1758)阿里哀追擊巴雅爾時路經羅布泊:“此水甚大,周行須兩月餘,準噶爾之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六十餘河皆匯於此。臣等沿途登高瞭望,不見崖岸。”又說羅布人“不食五穀,以魚為糧,織野麻為衣,取雁毛為裘,藉水禽翼為臥具,言語與諸回不通”。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卷二《羅布淖爾所受水下》,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第 121~122 頁。楊鐮在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多次對羅布人進行調查,指出“阿不旦”是當地方言“水草豐美,適宜居住的地方”之意。參見楊鐮:《雲遊塔里木》,收入作者《發現西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31 頁。這些情況表明當時羅布泊地區生態環境尚屬良好,清朝的行政勢力也已延伸到荒漠深處。此外塔里木河兩岸、孔雀河下遊直到羅布荒原,在歷史上都是廣義的羅布人定居的區域(參見夏訓誠主編:《中國羅布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年,第 449~450 頁)。羅布人在河道中大量鞣製毛皮,這應是他們將孔雀河稱為“製皮匠之河”的原因。

④ 參見段公路:《北戶錄》卷上《孔雀媒》,收入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 3 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年,第 2130~2131 頁;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六·羽篇》,收入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 2 冊,第 1644 頁;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一《禽鳥二·孔雀》引牛肅《紀聞》,第 3775 頁;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九《禽四·孔雀》引段公路《北戶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74 冊,第 398 頁下欄;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九二四《羽族部十一·孔雀》引《晉書》,第 4104 頁上欄。

作者簡介:鄭豪,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責任編輯 桑海]